

燕京大学史稿

工作简报〈二〉

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

2000年8月20日

本期目录

- 试论陆志韦的教育思想与工作实践 王百强 (1)
- 顾颉刚年谱有关燕大内容摘抄 顾潮 编著 王百强 辑录 (13)
- 洪业传 (美国) 陈毓贤 著 叶扶疏 摘录 (24)
- 张东荪其人其学 来新夏 (36)
- 坐中多是英豪
——燕大新闻系校友与《大公报》 王芝琛 (38)
- 从日本宪兵队牢狱死里逃生记 谭邦杰 (42)
- 担任过驻四国大使的柯华 易 飞 (62)
- 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 Andrea Au 著 张澍智 叶道纯 译 (64)
- 《燕京大学史稿》反馈意见 (69)
- 《燕京大学史稿》勘误表 (74)
- 海内外校友资助校史工作芳名录 (82)



↑为庆祝《燕京大学史稿》胜利出版,编写委员会于2000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出席名誉顾问、顾问、嘉宾、编委60余人。

图为大会全体合影。

摄影:梁伯枢

试论陆志韦的教育思想与工作实践

王百强

二十世纪初，一大批从事学术工作的知识分子，都在探索国家民族贫穷落后的原因。来自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存于国内的腐败政治，停滞衰退的经济，保守落后的教育，这些内忧外患强烈地刺痛着他们，激励着他们中的多数，都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孜孜不倦地探索真理，寻求推动社会进步的方法。尽管会遇到不少困难甚至严重挫折，但他们仍然以无限的热忱为中国的振兴贡献自己的一切。陆志韦先生，就是其中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位代表。

陆志韦先生是中国现代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作为学者，他早年曾留学美国研究心理学，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教学工作并继续从事心理学研究，成为较早地将从哲学新分离出来的心理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先导者之一。在三十年代中后期，由于战争影响经费来源减少，使他所从事的实验心理学研究受到限制，乃转而从语言学入手继续他的事业，从而深入并扩展了其研究范围，又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陆志韦还是一位诗人，他早年写的白话诗在体裁上独具一格，在当时也具有开创意义，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和推崇。

作为教育家，陆志韦的主要经历在燕京大学，担任过心理系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代理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校长等职。他在该校教学、工作、生活近三十年，他的教育思想和工作实践，和燕京大学的发展过程有着密切关系。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办的私立教会大学，它在彻底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陆志韦作为学校主要的领导者之一，他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是校内外、教育界、社会上以至国内外所公认的。因此，燕京大学虽已不存近半个世纪，陆志韦先生也已逝世近三十年，而历届燕大校友对他仍存有深切怀念和崇敬的心情。在当今我国社会科学界和国际友人中，陆志韦的名声仍是有一定影响的。

一、清苦勤奋的学路历程

陆志韦先生，原名陆宝琦，清光绪十年——1894年2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父亲为清代拔贡，虽有功名未入仕途，靠在本镇刘姓“当铺”作管账先生以维生计。陆志韦七岁丧母，留有兄妹六人，他最小。后来继母又生一妹，均由继母带领度日。

陆志韦五岁入刘家私塾，读了六年古书。他聪明过人，千字文章，口诵五遍即能熟记，得到乡里称赞。光绪年间，东南各省开办新式学堂，1906年陆志韦十二岁时便被送进江苏省吴江县震泽小学。他入学一年，即完成小学全部课程，英文、算术、生物等科还取得优异成绩。次年，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不幸父亲患肺病弃世，陆志韦只能靠“当铺”主人刘锦藻的资助入学。

陆志韦自幼缺少母爱和家庭温暖，性格内向、孤独，甚少与人接触、交往。当时所处时代，正值清末政务腐败，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下，人民生活苦难重重，陆志韦遂养成奋发向上，自立于人的志向。虽则经济上刘家有求必应，但他认为不应长期依赖别人资助上学。他对所在教会学校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员的表现有不同看法，未向学校申请补助，而靠自己的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奖学金维持学业。

1910年陆志韦十六岁时，升入苏州东吴大学。当时已是武昌起义前夜，社会动荡不安，他

对个人和国家前途甚觉茫然，乃开始读一些古代哲学著作如王守仁的《传习录》、《庄子》、《唯识论》等书，试图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在东吴大学他接触的是基督教生活环境，他对学生一定要作礼拜、读圣经课有反感，但对人生不是让人服侍而是服侍人的基督教义却很赞同，认为应有这样的人生态度。因此，第二年春天，他加入了基督教。当然，那时他对基督教的认识还是相当朦胧的。

为了能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深造的机会，1911年，他到北京考取了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可他发现自己在学习上、社交上均不适应。第二年只好又回到东吴大学读心理学，还兼任惠寒小学教员职务，增加收入，维持生活。他在1913年大学毕业，取得文学士学位。之后，留在附属中学教了两年书，讲授中文、英文和地理课程。在此期间，他读了皮尔逊（Pierson）的语法、杰姆斯（James）的实用主义哲学和康德的哲学等英文书籍，从中接触到了一些科学知识，也提高了英文水平。这对他以后的治学、执教有着很大影响。

1915年陆志韦以学习优秀获得教会资助，保送到美国留学。1916年，二十岁的陆志韦便只身赴美，进入范德伯（Vanderbilt）大学和彼阿伯第（Peabody）师范学院学习宗教心理学。在那里，他发现美国的宗教心理学并不符合他的志趣，恰在第二年他获得一笔助学金和半工半读的机会，便转学到芝加哥大学去攻读生理心理学。他学习十分勤奋，专心致志，每天学习、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很少休假。至1920年，终以博士论文《遗忘的条件》（The Conditions of Retentions）* 取得了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学习期间，他很少有机会和条件去参加美国人的社交活动，但他也发现美国人的一些优点：美国确有许多在科学技术上有成就的人；美国企业家有惊人的组织才能和毅力。不过他对美国提倡的“民主”“自由”并不赞同，认为这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的事。在他的经历中，还尝到过种族歧视的滋味，看到过美国黑人的处境。作为一个有为的青年学子，民族自尊心驱使他当时对中国的政局极为关心。他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十分不满；“五·四”运动掀起了“文学革命”和反侵略运动的洪流，对他确有一定震动和影响。祖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吸引他很快作出了回国的决定。

二、为倡导和推行心理学的科学化而努力

1920年，年仅二十六岁的陆志韦博士回到祖国。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执教，1922年又应聘于南京东南大学讲授心理学，兼系主任。

从1920年到1926年间，这位踌躇满志的青年学者，以他渊博的学识和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对刚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新兴的心理学科，进行了科学的探索，从而在教学和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在教书之余，经常写作和翻译一些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他撰写的《订正皮纳西蒙测验》、《教育心理学新论》和翻译的《教育心理简论》** 等书，率先向中国介绍了巴甫洛夫学说和西方心理学各流派的理论和方法，并通过自己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从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在国际上，二十年代初，他在美国发表的关于记忆条件的研究，常被美国心理学教材引用。在查普林等编写的《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这本美国心理系专业和研究生使用的教材中，陆志韦是唯一被提到的中国当代心理学家。

1921年10月10日，陆志韦先生与出身浙江温州富户的刘文瑞女士结婚。婚礼是按基督教仪

* 载于“The Psychological Monography”1922年第142期。

** E.L. 桑代克原著。

式进行的，由曾在南京神学院的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作证婚人；国内外许多学者参加了他们的结婚仪式，其中就有美国教育家杜威博士和中国的胡适先生。

刘文瑞的胞兄刘廷芳，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与陆志韦相识，1920年获得心理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司徒雷登聘请到新建的燕京大学执教。根据刘廷芳的建议，初掌燕大校长的司徒雷登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在宗教信仰之上，裁减了不称职的原为传教士的教师，延聘国内外许多知名学者来校任教。1926年，司徒雷登路过南京时曾到陆家作客。他向陆志韦介绍了燕京大学的办学意向和发展鸿图。当时燕大正处在从北京东南隅盔甲厂的偏僻旧址，迁往海淀新建的校园过程中，学校的局面急待开展。司徒雷登发现陆先生与他志趣相投，曾流露有意聘请陆先生北上执教的想

当时，北伐战争正由南向北推进，北洋军阀在南京一带盘踞，兵匪横行，骚扰百姓。陆志韦曾掩护被孙传芳派人追捕的进步学生；陆家也遭受过张宗昌的散兵游勇的掠夺。这使他产生了北上寻求稳定教学和研究环境的想法。于是，在1927年4月5日，陆志韦先生应燕京大学聘请，出任燕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教职。从此开始了他在燕园长达二十多年的教育事业，并使他的声名和威望与燕京大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燕京大学心理系是最早建立的学系之一。1919年燕大尚未设立文理法三个学院，而称为文理科。当时设置的学科有24个，心理学科即为其中之一，但它与哲学在行政上是合一的，统由美籍教授博晨光（Lucius C. Poter）负责。1921年刘廷芳建议哲学与心理学分开，成立心理系，乃由刘廷芳兼系主任，一直到1927年为止。

陆先生到达燕京大学时，心理系尚在初创阶段，基础比较薄弱。他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学系筹建工作和教学活动。首先征得学校拨款千余元，购置仪器、图书，使系里具有最起码的学习、实验设备。刘廷芳在美国讲学，同时也为燕大心理系筹款，得到白兰女士（Mrs. Mary Blain）2000多美元的巨额捐款，充实了心理系的图书和仪器设备。学校迁海淀新址后，心理系设置在穆楼东部二层。经陆先生几年筹划，心理系逐步具有了相当的规模，拥有了一间图书室、一间大实验室、五间小实验室，后来又陆续增加了动物实验室、暗室、办公室和另一间大藏书室，以及一批作教学和实验用的科学仪器设备。这在当时的大学中是相当先进的。

心理系在燕大是一个小系，本科主修生和研究生往往总在十人以下，甚至1936年无注册生。但为贯彻燕大整体办学方针，在师资、课程配置上，陆先生都严格掌握心理系的业务培养要求。1923年，原即开设有人类的行为、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课程，以后增加的课程常与欧美大学心理系相似。^{*} 陆先生任系主任后，增设的课程有心理学的近代发展、应用心理学概论，使本系的课程设置趋于固定成型。1927年陆志韦讲授的系统心理学是在全国最早开设的。其内容是对心理学主要学派的理论基础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讨论。他在课堂上不照本宣科，也不用讲义，却指定许多阅读材料；在讲课时跟聊天一样，常常是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由于他学识渊博，头脑敏锐，对哲学、文学有很深的修养，又受过现代科学的严格训练，有精密的分析能力，熟练的分析方法，因此在讲授系统心理学时，不但对已有的心理学派有极明晰的分析，还对当时欧美心理学的状况进行介绍。他所作的分析往往一针见血，一下子就把貌似复杂的表面现象揭穿，指出其本质所在。陆志韦认为他大体属于行为主义学派，但不是美国那种行为主义；而是以一种严格的科学态度，把所研究的心理限制在可以进行客观观察和分析的限度之内。对此以外的东西则抱怀疑态度俟诸科学的发展。陆先生不同意把科学手段尚未触及的领域一概予以否定。他指出这种态

^{*} 如儿童心理学概论、教育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感觉心理学等。1925年刘廷芳兼系主任期间增有：人类行为的解释、青年心理学、高级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宗教心理学、高级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等。

度貌似科学，但既不能解决问题，也无助于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是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严格遵守科学规范，又不被它所限制，这是陆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

燕大心理系在陆志韦先生领导下，在系的教学和科学活动中，突出了心理学科的理论基础、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的方法。这都是心理学科学化具体体现。陆志韦在学术研究中最感兴趣的是思维问题，但这方面的实验材料极少。于是，他从可以进行客观观察的语言问题入手，而语言也是思维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他在1932年发表的关于儿童无限制联想的研究，其主旨在于探讨中国语言在思想上的影响。他通过儿童和成人间一系列的测验，收集到数万个数据，用以探讨儿童的语言构造和语言习惯对于联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儿童联想的差别，主要暗示了语言惯例的差别。

为了在中国倡导和推行科学的心理学，陆志韦还做了如下两件事：

首先是发动组织了心理学会。

本来从1934年开始，北平的五大学（燕京、辅仁、清华、北大、师大）心理学界即有大约每月一次聚餐的联谊活动。其后又有其他心理学家加入。会上有各同事对中国心理学现状和未来相互交换意见。燕大心理系始终为心理学导向新领域提出建议，并促其实现。1935年，陆志韦发动组织中国心理学会，同事们公推陆志韦（燕大）、樊际昌（北大）、孙国华（清华）负责起草章程。后又向南方心理学界征求意见。1927年1月，中国心理学会正式成立，陆志韦被推选为主席，在全国理事七人中，就有陆志韦、刘廷芳两人。1935年12月，陆志韦提出审查普通心理学名词，获得各大学同意，联名致函国立编译馆，1937年1月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召开审查会议，公推陆志韦为主席，完成了最后的勘订工作。

其次，主持了《中国心理学报》的编务。

1936年陆志韦建议出版《中国心理学报》，经大家同意推选陆志韦、孙国华、周先庚三人筹备，由陆志韦担任主编，燕大心理系为主办单位。学报第一期明确指出：“学报以提倡科学的心理学为职志，内容以实验研究的材料为主体”。陆志韦在编后语中强调了开展科学心理学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心理学现在“已进入确实研究之域，不复与道听途说之流计较得失；而其发扬光大，以树立我中华民国之心理学，则尚待吾人之努力”。

燕大各系科高年级和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往往是与其导师的研究工作相结合的。学生们的研究课题，往往就是导师致力方面，从而一些研究成果经常是师生共同取得的。陆志韦在指导学生的研究工作中，也充分体现了他在推行科学心理学方面的努力。比如1937年毕业的“燕京才女”郭心暉，她的毕业论文《儿童语言的研究》，对4名3到5岁儿童的自然语言进行记录，又对16名7到9岁儿童进行填句测验。她通过直接观察，根据儿童说话的发展，给予某些启发暗示，从而收集到儿童语言发展的客观材料；再从大量实际记录中从语言的长度、语言的功能、语句的结构、表现在语言中的思维等方面进行分析，获得了非常有意义的结果，从而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郭心暉这篇论文，具体体现出心理学家严格的工作程序，是陆志韦极力推行科学心理学教学工作成果的良好范例。

三、主持校政，竭尽心力为中国办好大学

1933年秋季，陆志韦先生获得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奖学金，按照燕京大学教师六年一次休假的规定，再次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心理学。为了更有效利用那里的优越条件，他整天埋头在实验室里工作。

1934年春末，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来到陆家，对陆夫人刘文瑞说：“托事部* 决定由你丈夫任校长，赶快写信请他回来。”过了两天，他又说：“中国处在危险之中，要志韦回来主持燕京，请你打电报催他回来。”是时，陆先生实际已踏上了经欧洲回国的归途。电报辗转投递，在瑞士赶上了他，但电文没说清催他回国的原因。他在北京火车站下车那天，正值冀东汉奸殷汝耕派特务骚扰平津。返校途中，他看到军警布防，知道华北形势更加紧张了。回到燕园后，当他得知是要他担当代理校长重任，立刻就变得严肃起来。

司徒雷登推举陆志韦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是因为原任校长吴雷川先生年事已高，辞去了校长职务。按照国民政府规定，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任校长。陆志韦在国内外既有一定的知名度，又是受的美国教育，曾被推举为燕京大学教师会的主席，多次为中国教职员的利益而仗义执言，因此，易于为美国托事部与校内大多数中国教职员所接受。

燕京大学是由校长和校务长双重领导的。校长英译为 Chancellor；校务长英译为 President。自从1929年燕京大学在中国政府立案以后，校长一职是由德高望重的前清翰林吴雷川担任的；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仍掌有实权。

当时燕京大学正处在实现正规教育的发展时期，在国难日深的形势下，如何正确对待校内外兴起的抗日爱国运动，又保持学校教务工作的正常进行，确不是容易办到又责无旁贷的事。陆先生原只答担任一年代理校长职务，可事实上一直干了三年，直到“七·七”事变，日寇占领了北平，才由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和校务长双重职务，用以应付日本侵略者的干扰。当然，陆先生并未卸掉责任，仍然协助司徒雷登处理学校许多行政事务。

陆先生正直、清廉，关心教职员工，爱护同学，尽力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让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因而在中外教工和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学校的教学制度和自由民主的学术空气得到坚持和发扬。教师可以采取不同教学方式或进行学术研究，国外回来的教师可将国外的新发现、新理论引进教学中去。法学院的老师还将《资本论》列为参考书，由学生到图书馆借读这本英文版的书，来开拓眼界。学生少的课程，可以到教师家中去上课。燕大实行通才教育和保证学生质量的整套管理制度，如考核综合知识能力与理解程度的新生入学考试制度；学生入学后的选系、选课制；考核学生成绩的学分制、积点制，以及转系制、淘汰制等，造就着一批批高质量的毕业生。从而使燕大在时局日益恶劣的情况下，却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其学术水平和威望不仅成为国内十三所教会学校之首，且与清华、北大等著名国立大学相伯仲。

关心时局，支持抗日爱国斗争

陆志韦先生以中国人身份代理校长职务，虽然学校内部建设及各项教学秩序，在全校师生共同努力下井井有条，欣欣向荣，但校外的现实、民族的屈辱、人民的劫难，却使他不得不把办学的事业和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个时期学生们掀起的抗日爱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他都以不同的方式予以同情和支持；尤其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他都以可贵的民族气节，义无反顾地为燕大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的学校”而英勇斗争。

1935年5月，燕大的左派学生当选为学生会的负责人，由学生会公开出版的《燕大周刊》，不顾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敦睦邦交令”，每一期都有抗日救国的宣传文章。学生会把有爱国思想的同学团结起来了，陆校长对此是支持的。他经常在不同场合发表对时局不满和支持抗日的讲

* 托事部设于纽约，是燕京大学美国捐款人设立的民间机构，主要掌握经济实权；在中国燕大则设有董事会，负责重大校政问题。

话。

1935年11月1日，由燕大学生会起草，联合北平十校发表了《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的宣言》；12月6日又邀集清华大学等十四校发出了第二次宣言。接着，12月8日，清华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女一中等十校代表都来燕大开会，讨论决定了请愿、口号、游行时间地点等部署。第二天即12月9日，燕大同学五百多人，编队取道小路，一面和沿途警察周旋，一面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的口号，走了十来里路到达西直门外。这时西直门已关闭，之后清华大学、北大农学院等同学也赶到了，不下两千余人，就地召开了群众大会；同时，在城内各校学生代表则向何应钦递交了请愿书。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的一些情况。陆志韦先生从学生抗日的热情中受到鼓舞，又担心他们受到当局迫害。这天下午，遂派出雷洁琼等中外教授三人，带一卡车馒头来慰问同学，劝说体弱女同学上车返校，但同学们没有一人离队，还是整队回到了燕园。

“一二·九”后的“一二·一六”大示威，燕大、清华队伍整队冲进西便门的铁路门与市内各校汇合。事先两校还各派出三十人先进城埋伏。次日，燕大学生自治会执委主席黄华在发动沿途学校学生时，被警察抓住。六七个学生被押在公安局一星期后，是由燕大校长陆志韦和清华校长梅贻琦联合保释出来的。

埃德加·斯诺曾在燕大新闻系教书，“一二·九”运动的发生和事后的宣传，他是直接的参加者。邓颖超因患肺病曾化名在香山养病，出院时由斯诺介绍到燕大美籍英文教师包贵思家中休息。此事，陆志韦是完全清楚和支持的。他曾让孩子们去看望这位“乡下妈妈”，并叮嘱不可讲话。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庐山召开各界会议，邀请燕大校长参加。陆志韦借口交通不便予以拒绝。

由于日寇大举进驻华北，战争已迫在眉睫，燕大内部分析有可能变成“孤岛”或被侵占，但最后决定是不走。为了应付时局突变，陆先生主持安排学校储备粮食、燃料、药品、纸张等。1937年春已不烧暖气，还从清华园煤栈买煤，把校内煤仓堆成了山。

在沦陷区坚持办学；身陷囹圄决不事敌

“七·七”事变终于爆发了。燕大作为美国人办的学校，日本人一时还未敢直接侵占，但对校内抗日活动，耿耿于怀，不时派特务在校外骚扰。清华大学此时已仓促南迁，燕大真的变成了“孤岛”。为接纳滞留沦陷区的青年，燕大于第二年秋季开学大幅度增加招生名额，由原规划的六百人猛增至一千一百余人。许多无力随校南迁又不愿受敌伪约束的外校学生能有机会进入燕大这块孤岛绿洲继续学业。清华南迁后，燕大开设了工程预备班，以便为大后方工科院校提供高年级生源。陆志韦先生此时对工科的兴趣特别大，多次到工科所在的化学楼去请教。时过几十年后才知道，他当时曾和萧田（燕大技工、中共地下党员）及蔡一涛总务长等五人，组织过“破坏交通队”，试图破坏清华园附近的铁路。

“七·七”事变后，燕园附近某美国教授家挂起美国国旗，日寇懂得燕园内必有抗日活动，便在校外发动“驱英赶美”活动，对燕大进行监视和恫吓。敌伪要各校开设修身课，燕大以从不开设政治课（宗教课、国民党党义课）予以拒绝。其他各校被迫参加“皇军”胜利的游行，燕大以路远为借口不参加。此时，不少学生要转到大后方或延安去，凡是走的同学，学校都为他们送行，由陆先生或司徒雷登请他们吃饭，大都资助些路费，由校医处吴继文大夫（地下党员）给他们打预防针，准备些药品；并替他们绝对保密或介绍关系。

1938年，燕大学生冯树功骑自行车在西直门外被日本军车轧死。燕大当即向日军发出书面抗议，并在校内召开了追悼会。陆志韦先生当着日军代表的面，作了沉痛的讲话：“……死者有一颗善良的心，他追求真、善、美，但是他却被假、恶、丑给毁灭了！……他向往美好的境界，向往正义、友谊和幸福，但他得到的却是黑暗、不义和残忍……”。在沦陷区的北平，日本占领军杀害中国人是屡见不鲜的事，而这次陆先生却是慷慨陈词，义无反顾。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天，燕大即被日军封闭。陆先生等十五位教师和十余名学生被捕，其他学生全被逐出燕园。陆先生等被投入监狱后，敌人威逼利诱用尽一切伎俩，让他们为敌伪工作，但他们大义凛然，决不事敌。陆先生被折磨得皮包骨头，卧病不起，日军侵略者却哄骗说只要“悔过自新”便可出狱。陆先生拿起敌人的笔写了“无过可悔”四个大字。后来陆夫人得知陆先生病重便通过燕大早期学生、道济医院院长郭德隆诊断病情恶化，取得“保外就医”住进医院。

陆先生经过医院治疗后回家调养，后来，日军以“违反军令”罪名，判处他徒刑一年半，缓刑两年。于是陆先生在敌伪特务严密监视下被软禁起来，全家只靠变卖衣物度日。除亲朋好友的一些支援外，中共地下党组织也通过友人给予一些帮助。凡借用的钱物，陆先生均折成美元写下借据，在抗战胜利后陆续还清。

1943年，敌寇监视逐渐松懈，燕大的同人和学生不断前来看望，吃茶，谈心，交换对时局看法。大家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在常来客人中，也有中共地下工作者，如费璐璐常为解放区采购药品，利用陆家作中转站，先储藏在厢房里，方便时再转运到平西解放区。陆先生在受监视下仍然敢于支持这项工作。此时，他的爱国主义和正义感更加深了。

主持复校，克服困难，保持燕大高水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陆先生在无限欢庆之余，第二天就去城里欢迎被日军关押四年的司徒雷登。17日，他约集洪煊莲、蔡一谔等与司徒一起研究了接管燕园、清查校产、筹备复校等事项。8月21日，复校委员会成立，由陆志韦主持一切筹备工作。

燕大复校消息迅速在校友中、社会上传开了。许多滞留沦陷区的教职员奔走相告，纷纷前来报到，要求参加复校工作。但陆志韦在大会上代表校方宣布的原则是：敌占时期凡与敌伪有关的高层教职员不得回校；低层人员为了糊口确无劣迹的可在承认错误后回校工作。

8月23日，陆志韦带领部分教职员和高年级学生进入燕园，勒令占据燕园的日军限期撤走。他们一面先接收燕园南部的宿舍，一面投入招生准备工作。经过短短的五十六天的紧张工作，通过毫不含糊的入学考试的一批新生，于10月上旬进校开始正常上课。

复校后，陆志韦先生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代理校长，司徒雷登仍任校务长。陆先生面临许多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经费短缺。燕大的资金虽是美国私人捐助，但美国战后有种种论调，说燕大从三十年代就显得“左倾”，不该资助。司徒雷登去美国争取经费颇费周章。1946年司徒雷登任美国驻华大使后辞职离校，向美争取经费改由陆先生出面，困难就更多了。

陆先生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在1946年8月24日燕大董事会在南京开会时确定的。司徒雷登既出任为美国大使，提出请辞，实是辞去了校长、校务长双职。燕大成都时期的校长孔祥熙（未到职，由梅贻宝、马鉴代理）也请辞，董事会也同意了。这样，董事会乃议决授权校务委员会共理校政，由陆志韦为主任委员。当时陆志韦应邀为《燕大双周刊》迎新特刊发表谈话，他正在滞留南京谋求解决经费问题，便寄回一信。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二战后的社会混乱的看法和对新入学的学子期望之殷切：“诸君新来燕大，湖光塔影，耳目清凉，与韦日来所见所闻，宛如

隔世。燕大非北山也，我人于入学欢欣就学之时，切谨念今日之中华民族，为世界上最凄惨之民族。诸君来此，实为师友共同研究抢救之方。读一日书，望思量此之用处。切身小利害已不及计较，大学生责任之重，未有甚于今日者矣。”“燕大现已面临空前之经济难关，存亡绝继惟此数日是决。设备师资皆非理想，然学校必为诸君尽最高之努力，决不令诸君画饼充饥。所望于新人者，小事忍耐，大事直言，庶君子相处以诚之道也。”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和国民党一些要人经常到燕大访问，陆志韦都得出面应酬。国民党又在庐山开会，这次未邀陆先生参加，会后却给他送来一枚勋章。陆先生把它扔到楼下，气愤地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还发什么勋章！”

李宗仁有一次来到陆家，想和陆先生拉关系，借口说要看看燕大美丽的校园，陆先生就势让次子卓明带他到燕园观赏风景，使李不得不扫兴而归。

陆先生遇到另一个难题是办工科的事。燕大规划没有工科，美国托事部只同意复校，对办工科不反对也不支持。幸从国内筹资有启新洋灰公司沙咏沧倡导，由天津工业家李烛尘等提供了一批开办费，以后托事部才同意办工科，提供了一些设备。陆先生请来美国工程师丁荫来当科主任。丁荫有一套因陋就简的经验，他利用日本人留下的半截楼，组织学生劳动盖成了一座五层方楼，用作工科的教室和实验车间。

在国民党统治下，法币、金圆券相继一再贬值，物价飞涨。1948年春，在校生845人，其中有425人获得助学金，几乎所有学生都申请救济。燕大在经济极端困难情况下，仍采取措施安排困难学生参加自助工作，给以生活补贴。陆先生一面向托事部力争，一面向国内资本家求援，千方百计把学校维持下去。

燕京人参加革命运动由来已久，学校支持和保护进步学生也是有传统的。这个时期学生爱国运动频仍，在陆先生主持下，校医处、汽车队和学生食堂等部门都自动给予支持，中外教师以个人身份参加支持学生的越来越多。游行队伍一出动，陆家自然成为临时的协调处，人来人往，电话频传。在当时，以校方名义公开支持学生运动的，大概只有燕京大学。1948年国民党公布黑名单，要逮捕进步学生，燕大被军警包围。陆先生在得知本校上了黑名单的学生，已在教师们的掩护下撤离，才与军方商定“约法三章”，召开全校大会。陆志韦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这样的聚会，在燕大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从前有一回跟今天的情形有点相象的，那是1941年12月8日10点的聚集。所不同的那一天来的是仇敌，是日本人；今天是我们同胞，是同胞将来共患难的日子多着呐……”会后，只允查找上了黑名单的，不允抓任何其他的人。结果当然他们毫无所获，灰溜溜地走了。

迎接解放，把燕京大学完整地交给祖国

1948年秋天，局势急转直下，东北即将全部解放。平津各大学纷纷议论是否南迁的问题。胡适向陆先生发出“向南迁移”的邀请，燕大也有人劝陆先生作出南迁的决定。几年来，陆先生已经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对它已不存在任何幻想。他通过与进步同学和共产党人的接触，特别是在军调部时，叶剑英同志曾赠给陆先生毛主席著作和延安带来的毛毯，所以陆先生拒绝南迁。他说：“谁要走，自己走，要校长下令南迁，不可能！”这个时期，燕大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一批批有组织地离校化装进入解放区，准备迎接平津地区的解放。

12月11日至12日，国民党的散兵溃败如潮，日夜拥挤着向北平城撤退。学生自治会组织起护校活动，陆志韦和其他领导人通夜在临湖轩值夜应变。一些中国教师和几位外籍教师也参加了昼夜值班。

12月13日西北方向传来隆隆炮声，随后是机枪声、手榴弹和步枪声，自清晨到深夜断断续续。高处可以看到校园北面圆明园照明弹和流弹的曳光，那里发生了前哨战。14日，枪炮声已经从南边五塔寺方向传来。15日凌晨，学生组织的纠察队员报告西校外有人声，经过问话，外面的人说是人民解放军，消息立刻传到办公楼护校委员会和临湖轩陆先生等领导人那里。一位外国教师把紧闭的西校门开了一条缝，他发现确是一位年青的解放军干部和两名士兵。他们首先和善地询问学校有没有受到损害，需要什么帮助。燕园解放了。

16日，陆志韦召开教职员会，宣告“我们已经解放了。”他提醒大家这个变革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或是革命都要伟大。陆志韦对绝大部分教职员愿意留下来感到高兴。愿意和他们共同把燕京大学维持下来，交给自己的祖国。

陆志韦是一个受过美国教育多年的基督教徒，他又是一个尊重真理热爱祖国的人。他对祖国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国内政治腐败深感痛心。他对国民党政权的黑暗统治不抱信心，而共产党的党风和政策，使他看到希望所在。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但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他就是以这种政治态度和观点处理燕大解放初期面临的各种问题的。

1949年初，美国托事部根据部分教师的提议，同意陆志韦为解放后的燕大校长。他们希望陆志韦为在中国继续办基督教大学的代理人。陆先生是个坦率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谢绝了美国托事部任命他为校长的职务，并在给司徒雷登的信中阐明“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清廉的政府”“中国从此有了新的生命，有了光明的未来。”他向司徒雷登介绍了燕大情况和自己的工作，写道：“没有一个学校能如此顺利地渡过难关。”

一贯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陆志韦先生，不仅拥护党的各项政策，而且亲身参加了重要活动和工作。1949年3月，他是到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少数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之一。他被邀请参加了中央领导同志召开的有关会议，参加了“五·一”“十·一”天安门的庆祝活动。教育部的张宗麟司长是他在东吴大学时的学生，仍然以师礼待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暂时管理办法，就是周扬和张宗麟在陆家草拟的。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邀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春，他曾托一位领导同志给毛泽东主席带去口信，主张政府接管燕京大学，由基督教办的私立大学改为国立。当时正值大军南下，政府只能给燕大日常急需的一些现金和口粮。为了燕大一千师生的学习和工作，陆先生只好不情愿地向美国托事部去争取经费。托事部负责人在回信中强调了“学术自由”，反对在基督教大学里开设政治课，目的是使燕大“仍属在华基督教团体指导下的私立学校，而不应该改为国立学校”。陆志韦对托事部继续拨款表示谢意，但他坦率地说明办学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科学和文化水平”，并申明开设政治课的必要性，政治课的经费是由学费收入解决的。经过不懈努力，陆先生终于成功地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不但把燕大维持下来，而且还有发展。1949年春，近半数学生参军、参加政府工作中途退学以后，到1951年春，在校学生已发展到1195人，达到燕大历史上学生空前多的水平。

燕大解放以后，教育政策是陆先生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1950年6月8日，他在参加了北京高教会谈后，在给燕大全体教职员的信中，畅谈了他对本校教育改革的一些设想。

首先，他提出了燕大正式兴办工业教育的问题。燕大创办初期，即曾设立制革、陶瓷等专业课程，由于经费人力条件不足，未能坚持下来。北平复校后，陆先生盼望中国有新技术人才以改变工业落后状况。虽未得到美国托事部的充分支持，却得到华北十余位工业企业家筹集的六万美元作开办费。但战后官僚资本主义的猖獗和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民族资本家未能继续支持经费，燕大办工业教育的计划遂告搁浅。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建设事业的需要，培养工业人才已刻

不容缓，陆先生的愿望终于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实现了。燕大从1950年秋季起，把理学院改为理工学院，除原有的理科各学系外，另设立了机械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国家教育部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拨了专款。到后来高等教育调整，燕大工科各系合并到清华大学。前后不到三年时间，燕大工科培养的学生被分配到全国各地重点工业和军事工业部门工作，都很快成为了技术骨干，为祖国的工业建设和国防工业作出了很多贡献。

对家政系，陆先生不主张简单的撤消它，而是改造它成为另一个新的学科，在儿童发育成长和食物化学理论和实践方面作出新贡献。这个计划虽然被撤消，但事实上，原来由家政系毕业的许多校友，在发展营养学理论和培养人才方面都作了许多工作，有助于解决四十余年来这方面人才的空档现象。

关于法学院，陆志韦先生主张政治系应与哲学系和西语系配合；社会系的教学方向应以劳动问题为主；经济系的教学方向应以国际贸易为主。这显然都是为国家的发展前途考虑的。

陆志韦先生还根据高校会议关于课程改革方面的决定，组织全校教师讨论了各系的发展方向和计划。

正当陆先生满怀信心地为教育改革费尽心力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战火迅速烧到鸭绿江边。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1月，由教育部长马叙伦召集了“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校会议”；2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接管了燕京大学，改为国立大学。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席批准，任命陆志韦为国立燕京大学校长。

1951年春夏之交，陆先生率领京津各大学学者、教授组成土改参观团，去西南参加土地改革。他在成都一次座谈会上讲话，直言不讳地提出：“教育不能速成”，反复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普及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就必须循序渐进……不能主观主义，形而上学，不能搞速成，速成必然会产生虚假现象。”他对当时流行的“教育速成论”，似乎已预感到其实质是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科学的表现。因此，他大声疾呼连说了几个“教育不能速成”。

1951年秋天，教育部根据北京大学发动的一次学习运动，于12月13日发出了《关于京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简称三反运动）。陆志韦先生坦然地参加了这次运动，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他在运动中是主要批判对象，毫无根据地被指责为“一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在燕大作了好些司徒雷登所不能做的违反人民利益的事”。……他忍受着无穷无尽的折磨，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检查自己，却没有人包括被他掩护过的学生站出来替他辩护。经过一系列批判，他与以前判若两人，谨小慎微，不苟言笑，思想上的痛苦只能闷在心里。

四、在语言学领域深入探索，再作贡献

1952年10月，陆志韦先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先后主持过有关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语法和汉语史的研究课题。

对于语言学的研究，确是陆先生的爱好。他从日本人的监狱出来，在家被软禁的恶劣环境中，即曾修订《古音说略》、《诗韵谱》等著作，并从语言史来探讨近代汉语语音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写了《释中原音韵》等九篇论文，总名《古官话音史》。燕园重光后，他在繁忙的校务领导岗位上，对于心理学和由它衍生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研究也未停顿。

这次来到语言研究所，他卸下繁重的校务领导重担，开始了他在语言学领域的继续深入探

索。在文字改革方面，他制定了英、德、俄、法几种外国人名译音统一标准方案；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北京口语材料进行分析写成《汉语的构辞法》；在研究汉语史方面，他还制订了研究《左传》语法的科研规划。

他担任过语言研究所第一组主任、汉语史组主任、中国科学院社会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争取留美学生回国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语言》杂志社编委等职。在五、六十年代，陆先生心情比较舒畅，情绪高昂，除了主持科研项目，研究课题之外，他在指导研究生培养青年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陆先生在青年研究员面前从不摆老资格，在设计安排好他们的研究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步骤后，就参加到他们的研究工作中去一起干。他治学严谨，矢志追求，遇有不同看法，他都认真考虑，对人宽厚，自己做的事如不被人理解那也无妨。他书房的墨盒上写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几个大字。

陆先生多才多艺，既是一位严肃治学的科学家，又是一位德高望重、一心一意为祖国培养有用人才的教育家；他还是一位抒情诗人。早在二十年代初，他即借鉴外国诗，主张舍平仄而用扬抑，提倡有节奏的自由诗和无韵体。他在二、三十年代即著有《渡河》《渡河后集》《申酉小唱》等诗集。他后来还用英文著有《中国诗五讲》（Five Lectures on Chinese Poetry），到1982年才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他在《渡河·自序》中提出：“我的浪漫不是千篇一律的浪漫；我的写实，不是写科学的实”“我决不敢用我的诗作宣传任何主义或非任何主义的工具。”不过，陆先生写的诗并非风花雪月和不可捉摸的奇谈怪论，而仍是反映着他的思绪和对当时时局的看法。比如三十年代初，他在《苍海月明珠有泪》的诗中写道：

家乡啊，高粱地里的家乡，
徒然是地里的一片金黄。
这年头人比高粱还瘦，
鬼国的巡逻铁骑猖狂。
……
鲛人在滩上饮声啜泣，
仿佛是人间亡国的哀音。
荒山枯骨此时寂静。

这充分显示了诗人对日寇的仇恨和对国民党不抵抗的绝望。陆先生的友好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评论说：“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各种体例的是陆志韦氏。”“他的诗也别有一种清淡风味；但也许是时候不好吧，却被人忽略过去。”直到1986年出版的堪称资料详实的《中国新诗集序跋选》，对他也只作了粗略介绍：“陆志韦，生平不详，浙江吴兴人。……《渡河》，1923年7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收入1920年至1923年的诗作。”我们不知编者是由于何种原因有意忽略对陆先生的介绍，还是确实知之不详。因为，1982年上述《中国诗五讲》中，在书末就附有作者陆志韦简略生平介绍。

陆志韦先生同中国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在五、六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严厉批判，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硬被隔离，受到接连不断的审查、批判。除了前面“三反”时的所谓罪行外，还加上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于1969年在三子卓元陪同下，下放到河南息县偏僻落后、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地区，被分配去养猪。

已经75岁的陆志韦先生，此时因活计重又吃不饱，心情日益不好，身体日益衰弱，至1970年3月已达神情恍惚，生活不能自理地步，直到同年10月才被批准回北京家中养病。但此时陆

先生的家早已不成样子。陆夫人已于前一年4月去世；在京子女全被下放“五七干校”；唯一留在家的只有年方十六岁的小孙女，怎么能服侍得了身患重病的爷爷呢！1970年11月，陆志韦76岁时终于去世了。由于国务院的要求，次子陆卓明才从干校赶回，把陆先生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陆先生的不幸遭遇，受到国内外知识界的普遍关注，为他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鸣不平。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陆先生彻底平反，撤消了加给他的所有不实之词，恢复了他的名誉。同年12月11日，在北京举行了有近千人参加的追悼会。邓小平、方毅等领导同志送了花圈；追悼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主持；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致悼词。《人民日报》在12月13日作了长篇报导。

1998年12月20日草于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文件

燕京大学档案及《燕大双周刊》等有关资料

董天民、李耄年、崔一华执笔：《陆志韦传》（北京出版社文史资料选编第40辑）

陆卓明：《忆燕园、忆先父》（燕京大学1945—1951年级纪念刊）

陆卓明遗作：《回忆燕园内外》节选

王恺增：《陆志韦先生留给我们的》（《燕大文史资料》第七辑1993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仲庚：《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燕京大学史料选编》第四期）

杨耐思：《陆志韦》（《当代社会科学名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叶彤：《关于陆志韦》（香港《大公报》1998年7月31日第四版）

范敬一：《回忆陆志韦校长在成都的一次讲话》（1998年手稿）

顾颉刚年谱有关燕大内容摘抄

顾潮编著 王百强辑录

编者按：中国国学和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自1929年至1937年曾在燕京大学教书。其间正值燕大发展并趋于全盛时期，由于燕大教学环境优越，国内外众多著名学者咸愿受聘来校执教、治学。大师们相互切磋、交游，带动燕大学风严正，无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均取得显著成果。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在燕大的八年是他在学术上最有成绩的“守成”阶段。当然，在日寇侵略愈甚，国难日深形势下，师生们不忘为国分忧，积极组织抗日宣传及其他活动，在“年谱”中也可可见一斑。为便于校友们直接了解当时情况，现将顾先生有关在燕大活动内容，摘编于后。

1929年（37岁）

4.29. 离苏北上，5月1日抵北平。何定生同行。

5月 应燕大之聘；6月职事定。

5.5. 郭绍虞邀赴凡社之宴，同席：陈垣、金岳霖、许仕廉、冯友兰、熊佛西、黄子通、徐祖正。

6.21—23. 将书籍由大石作运至燕大。

6.27 复南下。

7.8. 月间 得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稿，甚赞之，遂荐彼至中山大学任教，并嘱彼为《燕京学报》撰稿。后钱君却中大之聘。

9.8. 由沪乘船北上，与家人同行，12日抵平。

9.18. 迁家至成府蒋家胡同9号。

9月 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导师、研究员及学术会议委员，该所导师研究员，还有：容庚、黄子通、许地山、郭绍虞、张星烺等。所长及学术会议主席为陈垣。又任燕大历史学系教授。任《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编讲义，学生有：班书阁、牟润孙（国家研究所者）、朱士嘉、李镜池（研究院者）、韩叔信、杨寔、齐思和、赵丰田、曹诗成（史学系者）、徐文珊（国学专修科者）等；又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

9.29. 为燕大校舍落成纪念会作《孔子事实的变迁》，未写毕，30日在纪念会上改读中山大学上古讲中《周易中爻词中之故事》。

9月 北京大学校长陈大齐及史学系来邀任北大教职，辞不受。“予以北大党派太多，攻讦太甚，婉词拒之，心中痛苦可知矣”（日记1973.8.补记）

10月 北大历史系坚邀，“因定史记研究一门，两星期一去，或一月一去，尽义务，不支薪，不上堂课，不算北大教员。”（日记1929.10.12.）

10.8—11. 重作《周易卦爻词中的故事》入《燕京学报》…11.3. 作此文跋，述此文之作，自26年底至今，首尾四年，生活不安，即此可见。

11—12月编《古史辨》第二册，并校排样。

12.1 与容庚合拟《古迹古物调查计划书》，欲进行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之访古。

- 12.15. 应《燕大月刊》邀作《四记杨惠之塑像》，将八月在甬直所览书中寻得之材料整理成文。述自去年国民政府禁止淫祀后，军队将庙宇拆毁许多，认为：“武人来干预文化的建设，我总觉得是可以害怕的一件事。”“结果，迷信未必能打倒，而先民的艺术遗产则真的打倒了。”
- 12.18. 看范成大《吴郡志》“杨惠之在昆山慧聚寺塑天王像之说动摇矣。…考一件事，其难如此。…下一期中当作《五记杨惠之塑像》一文，重新考证一下。”

1930年（38岁）

- 是年 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学术会议委员，研究《尧典》、《皋陶谟》、《禹贡》之著作时代问题，《周易》经传之著作时代问题，三皇五帝三王之系统问题。参加国学研究所学术会议。又任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任“中国上古史研究”课，写讲义。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主编此刊七、八期。
- 1.3. 作《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第一学期讲义序目》“本学期讲义，自去年10月8日至今日止，历三个月，得十多万言。”（日记）
- 1-7 编《古史辨》第二册毕。
- 2月 新学期开学，学生有：李镜池、韩叔信、齐思和、葛启扬、曹诗成、朱士嘉、赵丰田、杨寔、徐文珊等二十四人。又有旁听生张维华等。
- 2-6月应杨振声邀为《清华学报》作《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写了24章，11万言。……历时三月余，其间曾病数日，于病床上得一联曰：“好大喜功，永为怨府；贪多务得，何有闲时”“为作文白发愈多，几成斑白”。（日记1930年4月30日）
- 4.2. 在本校学术会议上宣读《泰皇、泰帝、泰一考》文，此会上陈垣讲《耶律楚材之生卒年》。
- 4.14. 因《燕大月刊》索稿，即将讲义《周易》一章题为《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及胡适、钱玄同二信交其发表，并说明接胡信后，“有无数话要说，可是直到现在尚没有找到时间作答”（胡信跋语）
- 4.30. 作《研究员顾颉刚工作报告》，总结自去年9月到国学研究所以来所任工作：研究《尚书》中《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之著作时代问题，……又研究《周易经传》之著作时代问题，……又研究三皇、五帝、三王之系统问题。…并已发表数篇论文。主编《燕京学报》第七期已编成，第八期亦集稿。
- 5.27. 编本学期讲义毕，共十一万余言。
- 6月 荐钱穆任燕大讲师，并电告彼，得其回电同意。9月，当钱君抵校后，为彼接洽各事。
- 8.10. 作《〈古史辨〉（第二册）自序》，曰：……
- 9.8. 《古史辨》第二册由朴社出版，至11月初版1500册售毕。
- 9月 新学年开学，仍任《中国上古史研究》课，指导学生作《史记》本纪、世家的研究。学生有：葛启扬、赵丰田、齐思和、韩叔信、朱士嘉、李镜池、徐文珊等，继续选修者十人。又有新选修者：陈懋恒、冯家升（史学系），叶国庆、谭其骧（研究院），赵澄、栾植新（国文系）等十余人。韩叔信于次年发表《虞初小说回目考释》云：“…去岁从顾先生研究《史记·五帝本纪》，为了练习研究史传说的方法，顾先生便把他未作完的旧稿交给我，嘱我加以改作，并且同时还供给了我许多材料，让我随意去取。”
- 9月下旬 搬家至蒋家胡同三号。

- 9月 荐吴晗任燕大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馆员。
燕大教授洪业自美返校。
- 10月 任燕大图书馆中文国学书籍审购委员会委员，该会委员还有陈垣、马鉴、容庚等。
是年加入燕大史学会。（参观在京各古迹均由顾先生计划并躬临解释）
- 10.9. 为雪如女士《北平歌谣续集》作序。（认为北平是旧日国都，该地人民与政治关系较密，“所以常用时事编入歌谣”）
- 11.15. 史襄哉来，长谈结集民俗学会事，17日作《中国民俗学会发起宣言》送史处。
- 11.18. 为《北平聋哑学校校刊》作序。…
- 11.24. 为王素意《校长和小学》作序。曰：…王素意在美研究教育，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燕大任教育系教授，并于四年前只手创办燕大附属小学，去年又兼办中学，“勤勤恳恳，注意儿童的个性及其才能，而鼓舞之，矫正之，无所不至。”
- 11-12月编校《古史辨》第三册。
- 12月 编就《燕京学报》第八期，与陈垣信。辞学报编委会主任。

1931（39岁）

上半年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学术会议委员。下半年该所所长陈垣辞职而告结束。
是年任燕大历史学系教授，上半年仍任“中国上古史研究”课；下半年任“尚书研究”课，编讲义。

任燕大图书馆委员会中文书籍审购委员会委员，直至1937年。

- 1.6. - 1.17. 离平赴苏赴宁而后返平。
- 3.19 齐思和作《与顾颉刚师论〈易系辞〉观象制品书》…
- 4.3. 与容庚、郑德坤、林悦明组成燕大考古旅行团出发。洪业、吴文藻藉春假之机也同行。“旅行目标，一方面为校中图书馆及小型博物馆搜购文物；一方面则以连年天灾人祸，历史文化之遗存必受摧残，将调查其损失及现状。”所到之处有：河北之定县、石家庄、正定、邯郸、魏县、大名，河南之安阳、洛阳、陕州、开封、巩县，陕西之潼关、西安，山东之济宁、曲阜、泰安、济南、龙山、临淄、益都、青岛等。5月29日抵平“予最晚归，历时二月。”所见民生惨痛状况，感受到强烈的刺激：老百姓家中“至于十一世纪以后（前）的用具，就找不出来了，然而他们所受的压迫和病痛，却是二十世纪的。官吏和军队要怎样就怎样，鸦片、白面、梅毒又这般流行，他们除了死路之外，再有什么路走！”此后，国家民族面临的亡国灭种之危机“永远占据了我的心。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旅行后的悲哀》）
- 6月 与旅行团同人编所摄照片目录，在校举办照片展览会。
- 6-7月 作此行报告《辛未访古日记》其中大名一节，与洪业合撰《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刊于《燕京学报》。
- 6.12. 应钟敬文、娄子匡邀，将吴立模作《苏州唱本叙录》略加修改并作序，寄《民俗学集鏤》指出：“中国向来缺乏民众生活的记载，而这些东西却是民众生活的最亲切的记载，我们应当努力地把它收集起来才是。”
- 8-11月 《作〈尧典〉著作时代考》
- 9月 新学年开学，“为了预备作《王制考》，改开了‘尚书研究’一课，一篇一篇地教读”